



UNFPA

2010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从冲突、危机到复兴：
变化的世代代



序

女人很少发动战争，却饱受战争的恶果。

性别暴力，包括强奸，是战争中令人厌恶却日益多见的一项武器。它带来的直接伤害远远地不止其直接受害者，它在不知不觉间便使今后世代代的家庭和社会分崩离析。

当前的冲突不仅仅是两国军人在边境交战，更多的是在一国之内为夺取控制权的斗争。这种斗争采取各种方法粉碎妇女、女孩、男子、男孩等平民的意志，并从生理、心理、经济、社会等方面剥夺他们的权利。

在当前的许多冲突中，妇女因被强奸、受到强奸威胁以及强奸导致的艾滋病感染、创伤和残疾而失去权利。女孩因受到暴力威胁而无法上学、遭受绑架或拐卖、家庭破裂或流亡，也被夺去了权利。在部分冲突中，男子也会因性暴力而被剥夺权利。同样，男孩有时也会受剥削，或被强迫充军。

《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研究了冲突和长期的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对妇女、女孩、男子、男孩的影响。报告还发现，许多妇女和青年男子已经战胜了那些看似难以克服的障碍，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并为和平和其社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作为一个国际发展机构，以促进妇女、男子和儿童人人享有健康生活和平等机会的权利为己任，确保让每一次怀孕都合乎意愿，

每一次分娩都确保安全，每一位青年免遭艾滋病毒/艾滋病侵害，每一个女孩和妇女都享有尊严并受人尊重。正如报告所述，UNFPA支持政府在妇女、女孩、男子、男孩赋权方面的工作，不仅为那些因冲突而失去权利的人们提供帮助，同时也向那些受灾害影响的人们伸出援手，例如在2010年1月海地地震发生后所提供的救助。UNFPA还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恢复至关重要。

媒体曾对海地地震进行了广泛报导，却忽视了吉尔吉斯的危机，尽管后者死亡人数数以百计，另有数万人流离失所。然而，上述两个地方的妇女和年轻人都正流离失所，成为难民。他们的处境危险，因为他们无法享受生殖健康服务，更易受到性别暴力的侵害。

本报告恰逢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通过10周年纪念。该决议呼吁武装冲突各方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妇女和女孩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免受性别暴力的侵害，也呼吁确保更多妇女参与斡旋及和平协定的执行。然而，本报告不仅局限于该决议，它还涉及妇女在冲突或人道主义紧急事件

中面临的特殊挑战,包括妇女自身如何做出反应、抚平伤痛、继续前进。她们不仅重建社区,使其恢复到之前的状况,更是在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建设着新的国家。

决议可以用于指导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冲突,构建旨在保护妇女、确保其参与建设和平与和解的行动框架。然而,决议不能取代基层社会所做出的努力,他们推动妇女赋权,并建设应对战争、地震或其它灾难等危机的长期恢复能力。政府应抓住冲突后复苏进程或自然灾害带来的机会,不仅要重建国家,更应把国家重建得更美好,重建得焕然一新,使两性平等,使所有人都享有权利和机会,并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过去十年的经验充分表明,必须摧毁危机、复苏和发展之间那些虚假的障碍。在战争或灾难发生后,人道主义援助应为今后的长期发展与和平播下种子,以确保相关国家能够做好更完善的准备,阻止将来暴力事件的爆发,并在像海地地震之类的特大灾难发生过后,能够更迅速地恢复常态。我们必须用社会、经济发展和赋权之间的良性循环取代危机和发展不充分之间的恶性循环。

发展和危机的连续性,而且反之亦然,都充分说明对发展的投入有利于减轻危机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比较最近海地地震和智利地震的影响,不难发现这种关系尤为明显。同时,在人道主义援助阶



2010年3月,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会见海地青年,这些青年通过太子港的Gheskio中心跟踪母亲和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

©UNFPA/Vario Serant

段的投入,能够形成重建社会的坚实基础。这种连续性也是相互作用的。

经验也证明,性别暴力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通常代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失败的机构、造成或容忍虐待的规则、被危险扭曲的性别关系和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等。战争和灾难不是造成性别暴力的根源,但经常加剧性别暴力的恶化,或者增加其发生的频率。

最后,国际社会应对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支持传统维和行动的资源越来越少,更多的资源则流入发展导向的干预措施,以帮助政府保护平民免受伤害,并支持其实现长期繁荣。然而,尽管政府承担着保护其人民的官方责任,社区和个人也应发挥作用,促进和平与安全。只有当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参与进来时,在维和人员离开后,一个正逐渐复原的社会才不太可能再次陷入混乱和恐怖。

联合国人口基金

执行主任

托拉娅·艾哈迈德·欧拜德



2010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从冲突、危机到复兴： 变化的世世代代

序 第ii页

概述 第1页

1 第一章
波黑，变革的催化剂 第7页

2 第二章
决议与现实：战斗的十年 第15页

3 第三章
身处复兴前沿的女性 第27页

4 第四章
危机时代中不断变化的性别关系 第39页

5 第五章
青年：冲突后社会的未来 第47页

6 第六章
无依无靠的生活：难民和在国内流
离失所的人 第63页

7 第七章
囚禁在家：被占领区的生活 第71页

8 第八章
未来十年将是怎样 第77页

参考文献 第86页

指标 第92页



概述

从冲突、危机到复兴：变化的世世代代

十年前，即2000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迈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一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认识到妇女和女孩在武装冲突期间及之后容易受到暴力行为的侵害，以及妇女未能或较少参与防止战争、建设和平及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等努力，安理会通过了第1325号决议。该决议是安理会第一次正式寻找方法弥补上述疏忽，并积极推动和鼓励世界各国妇女在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发挥潜能。

《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发布恰逢这项历史性决议通过10周年。该报告强调了在决议通过10年后的今天，妇女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紧急事件或长期危机中的处境。

今年的报告与以往各年度报告截然不同，不再采用学术方法研究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使命和业务有关的议题。本报告使用较为新闻体的方式，描述了妇女和女孩、男子和男孩在冲突和其他灾难事件发生后的生活经历。他们代表自己讲述其面临的挑战，讲述其社区如何应对危机和灾难、如何变得具有更强的恢复能力，讲述他们中有多少人已参与了重建和复兴进程。报告专题选取的个人既不是统计师也不是人口统计学家。他们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村居民，他们是在破碎的城市中努力存活的城市居民。许多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幸存者目前正在他们的社区中帮助同胞恢复

和调整。

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活动人士与政府、联合国各机构、捐助国和基金会开展合作。同时，传统的部族长老和宗教领袖也在努力安慰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促进遭受毁灭性打击的社会恢复其原本的文化根源和原则，因为这些文化根源和原则经常被战争、难民外逃、侵占和自然灾害所扭曲。地方层面的行动不仅包括医治伤患，更重要的是反思旧习俗、探索新时代的行为规则。

随着安理会在2000年通过了第1325号决议，有关妇女保护的另几项决议也在之后几年陆续得以通过。相关国家的活动已从基层开展，而那里的冲突和灾难的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安理会关注的焦点。他们只是凭经验得知，目前有很多重建工作亟待完成，他们也正开始投入工作，并在联合国各机构、有关基金和

在2003年的内战达到顶峰时，利比里亚妇女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举行示威游行。图像来自名为《祈祷恶魔重归地狱》的电影。

©Pewee Flomuko

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决议

第1325(2000)号决议有关妇女、和平和安全，是第一项旨在解决武装冲突及其后果对妇女影响的决议。决议呼吁武装冲突各方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妇女和女孩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免受性别暴力，特别是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

第1820号决议(2008年)是第一个专门处理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决议。该决议确认性暴力为安全问题，并指出，性暴力犯罪一旦被作为针对平民的一种战争策略，将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第1888号决议(2009年)是第1820号决议的延续，强调必须从和平进程一开始就处理性暴力问题，并将性暴力实施者绳之以法。决议呼吁将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作为特别条款，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联合国发起的和平谈判议程的使命。安理会还强调了从和平进程和调解努力一开始就处理性暴力问题的重要性，以保护危难人口和促进全面稳定，尤其是在停火前人道主义准入和人权协定、停火、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安全部门

改革安排等方面。

第1889(2009)号决议重申安理会以相互促进的方式继续全面执行第1325(2000)号、第1612(2005)号、第1674(2006)号、第1820(2008)号、第1882(2009)号、第1888(2009)号决议的决心。安理会表示深切关注妇女在充分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参与冲突后的公共生活方面依然面临各种障碍。它认识到，妇女的边缘化可能推迟或损害持久和平、安全与和解的实现。

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妇女和儿童保护中心助理专员本内塔·霍尔德·沃纳(Bennetta Holder Warner)。

©VII Photo/Marcus Bleasdale



方案及人道主义组织提供的帮助下勇往直前。

这份报告基于波黑、海地、约旦、利比里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西岸)、东帝汶和乌干达等国的采访和报告。不同国家被选择的原因各不相同。部分国家刚刚走出冲突,正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始重建。部分国家经历了战争和流离失所导致的深刻社会变革。联合国在上述所有国家都有活动,在某些情况下为综合维和任务。然而,联合国各机构在上述各国都作为一个积极小组,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提供支持和帮助。利比里亚和乌干达正处于最近冲突所带来的创伤中。西岸的故事说明了被占领导致的特殊问题。在约旦,伊拉克难民谈论着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波黑的事例说明了多久才可以治愈战争的受害者,社区可以如何帮助或阻碍这一进程。海地的贫困人口历经几十年的动乱,在两次毁灭性的飓风和一场灾难性的地震接

踵而至之后,正努力重建国家。

社区组织,即便有的组织人数较少,会同较大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其在社会基层的工作,已经扩大了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宣言的意义。十年前对各国政府就解决虐待或忽视妇女和女孩的问题的呼吁,目前已稳步发展成为一项包括所有社会成员的更为广泛的运动。例如,今天人们更多地注意男子和男孩所遭受的生理及心理创伤,即便是在极不相同的国家,人们也都同意这一点,认为必须将其作为重建社会和生活、创造促进和平的空间的一部分。

目前,针对创伤受害者的心理辅导正迅速增加,而且在许多地方更为专业化。创伤过后的社区,其需要不仅局限于和平协议和冲突之后停止暴力,还包括需要借助非正式和正式方案深入探索其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以解释暴力发生的原因或冲突结束后暴力仍然继续存在的原因,

2 联合国妇女署

联合国大会于2010年7月2日一致投票赞成创立一个名为“联合国妇女署”的新实体,以推进联合国在满足全球妇女和女孩需要方面的工作。成立联合国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实体,即“联合国妇女”,作为联合国改革日程的一部分,有利于整合相关机构资源和使命,并使其

发挥更大作用。

潘基文秘书长指出,“‘联合国妇女署’的成立,将极大地增强联合国在世界各地促进两性平等、扩大机会和反对歧视的努力。”

“联合国妇女署”将合并联合国经社事务部提高妇女地位司、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秘书

长两性平等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等四个机构。

“联合国妇女署”将于2011年1月正式开展工作。

3 落实决议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 通过与许多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帮助各个国家和地区落实第1325号决议及其后有关妇女、和平和安全问题的决议。UNFPA在国家一级的大部分工作重点放在促进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公共机构能力的提高, 使其将性别问题纳入和平与安全、预防、保护和参与等领域活动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预防

在哥伦比亚, UNFPA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推动性别问题主流化, 并使军队和警察对于性别暴力问题较为敏感。

在格鲁吉亚, UNFPA对服务提供者就生殖健康、性和性别暴力、被强奸幸存者的医护管理等问题开展培训。

在科索沃, UNFPA支持卫生部和“科索沃非政府组织妇女网络”开展心理培训, 以推动两性平等、妇女赋权、预防和消除性别暴力。

在利比里亚, UNFPA支持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创设心理和社区支持服务, 特别是对性和性别暴力的幸存

者提供帮助。

在尼泊尔, UNFPA支持其“执行第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实施。UNFPA与其伙伴组织还为2008年尼泊尔制宪会议的妇女成员开展有关基本人权的培训, 培训重点为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和第1820号决议。

在塔吉克斯坦, UNFPA与一个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开展合作, 依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打击对妇女的暴力侵害。

保护

在博茨瓦纳, UNFPA支持并提供性和生殖健康服务, 包括艾滋病毒预防, 以及为难民服务的诊所。

在哥伦比亚, UNFPA通过为项目提供支持, 协助机构和社区提高其能力, 扩大涉及应对妇女暴力的综合保障体系。

在科特迪瓦, UNFPA已建立向性别暴力幸存者提供服务的中心。

在印度尼西亚, UNFPA支持亚齐省规划和发展机构起草旨在解决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行动计划。

在科索沃, UNFPA正与劳动和

社会福利部合作制定旨在为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提供庇护的筹资战略。

在黎巴嫩, UNFPA帮助服务提供者提高能力, 确保其为冲突后社区的妇女服务提供具有质量的精神、心理和生殖健康服务。

在利比里亚, UNFPA支持司法部成立“性和性别暴力检控组”, 开通24小时电话热线, 并设置专门法庭处理性别暴力案件。

妇女参与

在哥伦比亚, UNFPA的人道主义策略涉及妇女参与有关人道主义状况的决策过程。人口基金还支持妇女组织参与和平进程。

在博茨瓦纳, UNFPA与当地州立大学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联合发起旨在提高议会酋长院全面解决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能力的项目。

在卢旺达, UNFPA协助国家警察更有效地处理性别暴力行为, 并促进其队伍中妇女的招聘和提拔。

并探索根除这一问题的方法。人们普遍认为,使青年人参与这些讨论十分重要,并在近年来开始实施了许多新颖的方案。各类、各年龄段艺术家都渴望通过他们的工作加入讨论,同时体育界人士也自愿与青年人一同工作。

与2005年联合国大会世界首脑会议的精神遥相呼应的是,即使是无意为之,很多市民注意到政府对于其人民负有“保护责任”。2005年,世界各国同意将保护其人民免遭大规模伤害列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予以协助,或在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伤害。关于“保护责任”的含义解释非常广泛。部分人认为,除了确保人民免受生理伤害,至少也应在精神层面保护人民,“保护责任”的范畴原本也是如此。考虑到冲突过后,财产权经常处于争议、家庭内部仍有暴力事件、街头存在犯罪行为,有必要在上述领域创建或增强法律和司法机构。各种职能机构,包括健康和教育服务机构,应加速恢复正常状态,并帮助预防未来的冲突。

性别暴力和虐待以多种形式继续存在,而通常武装冲突会加剧这一问题。此外,对于流离失所或在自然灾害中无家可归的家庭,其在难民营中生活的不稳定,也会使得上述问题愈发严重。人们现在认识到,性别角色可以因战争、军事占领和难民生活而导致破坏和改变,而所有这些



都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影响,人们彻底了解这些问题并使知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机会,则是冲突后世界的前导。在许多正常生活已被打乱的国家,人们往往借助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的帮助,通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方式在许多方面开展工作,使未来更加美好。

▲ 杜布拉夫卡·萨尔西奇-迪达拉维奇 (Dubravka Šalić-Dizdarević) 是萨拉热窝国立大学医院的一名医生,也是波黑的一名顶尖心理咨询医生。她说:“酷刑也包括使被刑讯人的整个家庭成为受害的目标。”

©VII Photo/Antonin Kratochvil



波黑， 变革的催化剂

2010年年初，一位住在莫斯塔尔的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妇，紧张地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同意讲述她那遭受战争破坏、再也无法复原的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种族冲突中，她的波黑塞族丈夫曾于1992年因拒绝穿上塞族部队制服而被枪杀。直到五年前，她终于能够根据DNA证据确认她的丈夫死于谋杀。这位老妇是一名克罗地亚人，她在波斯尼亚族和塞族之间的交战中也曾被抓。在她的丈夫被带走之后，她提心吊胆地度日，也曾受到死亡的威胁。为了找到她的丈夫，她走遍了一间又另一间办公室，询问了一名又一名士兵，但希望却极其渺茫。她寝食难安，东躲西藏，有一次晚上甚至不得不躲在邻居家的煤仓中，防止那些武装分子把她也抓走。

当条件允许的时候，她就回家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自来水了，我不得不去蓄水池取水，”讲到这里，她的脸突然痛苦地扭曲着，“在回来的路上，我被三名士兵截获，他们让我放下水，跟着他们。”当她回忆起那接下来数小时的性暴力时，她的故事变得极其恐怖。“他们折磨我，对我做出了一些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她说，“我恳求他们杀了我。”

这类上世纪90年代在波黑、卢旺达和西非等地发生的暴行，促使国际社会将这种野蛮行径列入“战争罪”。最早是地区法庭审理此类案件，之后1998年《罗马规约》创造的国际刑事法院对此也开始予以

处理。2001至2010年期间，世界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和达尔富尔问题，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围绕着此类罪行展开反复辩论。上世纪90年代的野蛮行径，是导致第1325号决议和随后其他几个决议陆续出台的起点。

这位莫斯塔尔老妇在其遭受虐待的时候已年逾五十。直到2006年时，她才与另一个强奸幸存者谈论其不堪的经历，她认为对方能够理解自己。当时她还饱受肾脏损害和高血压的折磨。“在此之前，我无法讲述我的故事，”她说，“我怕我会被指责。这样的耻辱实在是太大了。”对她生活在国外的两个儿子，她也只字未提。这个已

站在被烧毁的工业园区前的波斯尼亚女人，在战争时期该园区曾是一个集中营。

©VII Photo/Antonin Kratochvil

近古稀的老妇目前还在接收心理治疗，她的故事说明了战争带给思想和心灵的长期创伤有多么严重。她和许多其他人的故事也表明，为了确保世人的后代免受这种暴行的侵害，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

近20年过去了，波黑人民的生命也在这场欧洲代价最高的战争中大量消亡，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人口不复存在。该国首都萨拉热窝，曾被围困长达4年之久。15年前，交战各方签署了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但在莫斯塔尔、图兹拉和萨拉热窝等分散在各地的不同城市，那些从“强奸营”和性侵犯中幸存下来的妇女，仍然生活在羞耻和恐惧之中，她们心理遭受创伤，长

期无法寻回尊严和赔偿。当遇到陌生人时，她们相信自己能够讲述过往的经历，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法做到。她们无法自控，在点燃香烟后，便开始颤抖，声音也变得嘶哑，哭泣不已。

尽管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但波黑妇女经常认为，在最为恐怖的那几个小时里，缺乏社区的帮助让她们更加痛苦。当许多人回到家里后，她们被亲戚和以前的朋友所遗弃和诅咒。她们仍然颤栗地记得，在拘留、侮辱和酷刑中幸存或逃过死劫的男子，在某种程度上却无法理解和同情妇女，反而认为她们让家人蒙羞。她们说，许多妇女开始感到内疚，她们有着难言之隐，往往将自己的故事掩埋多年。

据估计，至少有10万人在波黑战争中丧生，约1万2千5百人至今依然下落不明。随着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波黑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各方都犯下了暴行。

例如，在一些波斯尼亚社区，妇女被与男子分开，在一段时间内被关押在一些随时都可能成为临时拘留中心的地方。她们一次一个或几个地被带出去，随之受到性虐待。部分人冒着被围攻的危险，通过购买香烟、寻找食物或水等简单的跑腿工作逃脱监禁。

或许人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确定有多少妇女在波斯尼亚遭受过性侵犯，或有多少儿童因强奸而孕育出生。据大多数人估计，在波斯尼亚遭受性侵犯的妇女约为数

波黑集中营酷刑幸存者协会主席艾尼萨·萨尔基诺维奇（Enisa Salčinović）（右）。该协会的2000多名会员中，四分之一曾被强奸。

©VII Photo/Antonin Kratochvíl



4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是一个联合国法庭，负责审理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冲突中发生的战争罪行。自1993年成立以来，它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版图，并为受害人提供了讲述她们曾经目睹和亲身经历的恐怖事件的机会。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审判犯有谋杀、酷刑、

强奸、奴役、破坏财产和其他严重罪行的人。起诉范围包括1991年至2001年期间对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各族人民犯下的罪行。

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大多数涉及塞族和波斯尼亚塞族犯下的罪行。无论犯人出自何种种族背景，法庭都会对此予以调查并提出指控。克罗地亚

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对塞族和其他人犯下的罪行也都会被定罪。法官已经裁定，强奸是波斯尼亚塞族武装部队成员使用的一种恐怖手段。

来源：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www.icty.org

万名。向当局报告的性虐待案例也是充满了问题，而对公众披露的社会风险也是一种威胁。波黑的微妙政治关系并没有方便战争罪行的核算。那些非政府组织为其索赔和政府承认的受害者，现在都已是中年以上的老人。虽然许多妇女家中只剩自己一人、生活贫困，但直到2008年她们才愿意登记成为受害者，领取政府的定期赔偿金。然而，对于她们来说，这本身就是其向前迈出的很大一步。

除少数人外，在本报告中讲述亲身经历的大多数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妇女不能予以具名。艾尼萨·萨尔基诺维奇（Enisa Salčinović）是集中营酷刑幸存者协会会长，她所在的协会负责监测受害者的健康状况并提供心理支持。长年的抑郁症，或者破裂和恢复周期会对妇女的一般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这些妇女也不会寻求

定期检查或癌症筛查。萨尔基诺维奇表示，协会的2000多名会员中，四分之一曾被强奸。大多数人在生理或心理上遭受过折磨。

1992年战争爆发后，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萨尔基诺维奇失去了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丈夫。她原本生活在富查，直到被人从家中赶走。在那里，她曾多次被塞族部队强奸。她被劫持者赶出家门，带着她的两个幼小的孩子，在前南斯拉夫四处流亡，直到她在斯科普里的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中遇到了她的妹妹。当被问及她和她的孩子经历了何种恐怖的生活时，萨尔基诺维奇只是摇摇头，不说话。坐在她旁边的艾斯米佳·昆都（Esmija Kundo）也来自富查，她说她的四个孩子们在战争爆发后遭受了精神创伤，其中一个孩子在读三年级时就被迫辍学，现在再也无法回去

读书了。她说她很气愤，因为她认为在海牙受审的囚犯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而她却费了很大力气才能申请一个小公寓用来安置家人，而且现在每天还是靠她死去的丈夫的社会保障福利过活。她无法工作，每两个月还要住院，借助药物稳定自己，每15天她还要去一个中心接受医生的检查。

巴基拉·哈塞契奇（Bakira Hasečić）是一位最为著名、最直言不讳的战争受害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她不知疲倦地在世界各地游说，倡导开展有关受害妇女的承认和赔偿活动，只要她认为这能够对别人有

“在这里你总会发现战争问题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背景。”

所帮助。她是“战争受害妇女”组织的创始人和主席，她本身也是一位强奸受害者。她积极主动的行动没有受到所有其他幸存者或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欢迎，他们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哈塞契奇所在组织小小的总部原本在萨拉热窝郊区，后来搬进了社会服务部门提供的房间。她曾经成功说服了政府官员，在有可供使用的资金时，将她的组织作为受害妇女申请政府赔偿的唯一渠道，此举在妇女团体界引起了纠纷。

波黑人权和难民部助理部长萨利哈·杜德雷亚（Saliha Đuderija）表示，过去官方对受虐待妇女的赔偿问题不够重视，现在这种非正式的垄断已经结束了。她指出，

受害者现在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办事处、“战争受害妇女”组织或其他妇女团体递交申请。杜德利加还表示，在国家（联邦）一级，目前还没有商定关于受害者的统一定义。

当波黑战争结束后，针对妇女的帮助在短期内没有出现短缺，而强奸营也成为了国际丑闻。杜布拉芙卡·萨尔西奇—迪达拉维奇（Dubravka Salčić-Dizdarević）是一名心理医生，也是萨拉热窝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的创始人和医务主任。她表示，地方性和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纷纷出现，但是很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并不具备在波斯尼亚开展工作的资格，他们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她表示，当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两年前，政府开始提供每月最多约达250欧元的赔偿金后，更多人愿意畅所欲言。“但并非所有的人，”她说，“因此，关于剩下的这些人，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大。鉴于其重要性，我国政府必须为许多仍然参与这一方案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她还认为国际社会“太早放弃了波黑”。对于那些不愿或不能承担这些具有争议的任务的政治家来说，留存的问题太多太多。目前，政府对强奸受害者的赔偿金每月约为280欧元，仍低于大多数退伍军人的赔偿金水平。

佳斯娜·泽切维奇（Jasna Zečević）在图兹拉经营着一家创伤受害者模式辅导中

心,名字叫做Vive Žene,意为“妇女万岁”。该中心开发了一种流动性的多维系统。泽切维奇说,“每一年,我们随着形势变化而改变中心的概念。”在战争结束前,该中心开始被当作住宅设施使用,现在则是提供门诊的心理诊所,同时还有几间卧室以备不时之需。她表示,中心的患者来自图兹拉周围广大地区,包括仍在使用中的8个流离失所者营地,“我们是心理学家、社工、教师、医生、护士、行政管理人员和律师。”

Vive Žene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工作方法的彻底性和其独立开展的经验推动型项目。“我们正在几个层面开展工作,”她说,“首先是心理治疗,我们称之为内在治疗,妇女需要个体化治疗。第二个层面,无论这些妇女身在何处,我们会帮助她们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实行后续护理计划。第三个层面是3年前制定的,关于受害妇女的权利的宣传和游说工作。因此,我们参与了目前有关酷刑受害者和家庭暴力的一切活动,但我们不把暴力受害者分为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两种。我们统一对待她们,因为我们发现她们之间存在联系。在这里,你总能发现一个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背景往往包含着战争问题。”

如果妇女愿意并且能够采取行动,该中心可以帮助她们在负责处理战争罪案件的法庭上准备证词。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波黑的法庭对大多数受害人的生命漠不关心。许多妇女感到失望,因为所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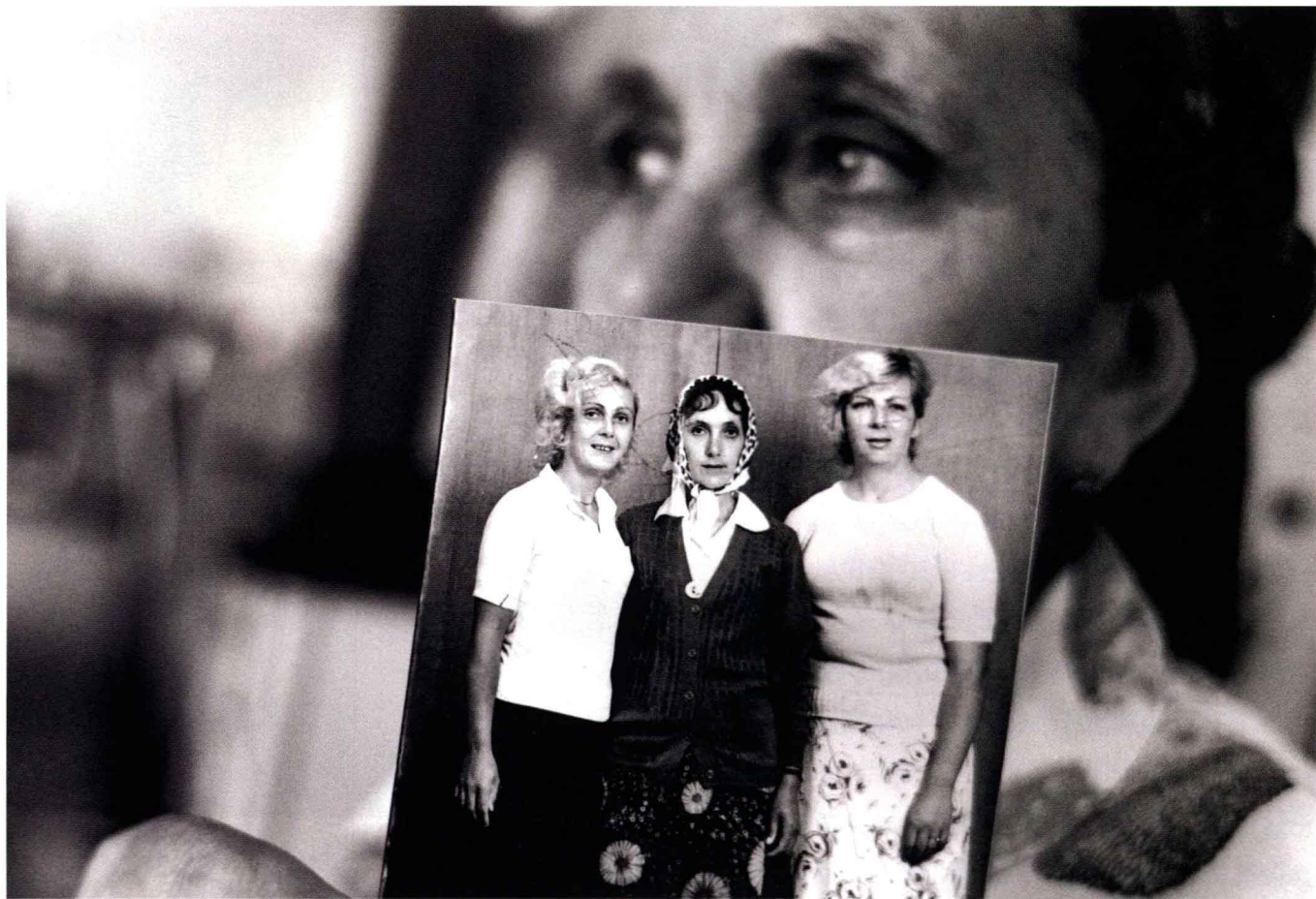


于她们的国际关注在战争结束时从来没有为其生活带来显著变化。此外,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在其2009年报告《谁的正义?波黑妇女仍在等待》中说,即便受害者在巴尔干法庭等国际法庭上出面,她们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赔偿。

泽切维奇邀请了她的几位病人与本报告的作者谈谈她们生活。在个别谈话中,有一位或两位妇女,是精心打扮过的,显然比较放松,而且能够讲述有关其亲身痛苦经历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位身体虚弱、身材消瘦的女子,她曾告诉泽切维奇,如果必要的话,她会“爬着来参加会议”并讲述她的故事。但是,她颤抖着,几乎无法

▲ 波黑“战争中的女性受害者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巴基拉·哈塞契奇(Bakira Hasečić)(右)。

©VII Photo/Antonin Kratochvil



▲ 波黑战争的幸存者在讲述自己和其家人的不堪经历。
©VII Photo/Antonin Kratochvil

言语。当她说到“然后他告诉我要脱掉我的衣服”时，她顿时崩溃，一边颤抖一边哭泣，最后被泽切维奇拥在怀中带走了。

另一位妇女决定把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但她抱怨说，2008年政府下令发放的赔偿金已经数月没有到达她手中。她去了贝尔格莱德为一次区域战争罪行的审判提供证据。她在那里表示，当战争结束她回家之后，她还需要忍受塞族邻居对她的恶意中伤。她想过组建一个关于受害者的新组织，但得知这比较复杂。“妇女对组建组织和斗争不感兴趣，”她说，“她们

孤立，贫穷。她们想知道这样做是否有钱赚。她们害怕家人受到骚扰。”这位妇女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丈夫，但是她在申请去美国定居时却遭到拒绝，因为红十字会数据库没有她的信息。“我的船沉没了，”她说。但她重新调整，寻找其他途径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Vive Žene为她提供了3年的帮助，最终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不能被具名。她从来没有告诉她17岁的儿子有关她被暴力强奸的故事，而那次意外怀孕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个故事，是1992年至1995年波黑战争耻辱史的一个部分，而这段历史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

人们会问：这个国家有多少因性侵犯而生下的儿童？答案是没有。没有人真正知道，因为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太麻烦，因为首先这对儿童本身有影响，母亲也担心说出真相后对儿童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强奸这种战争行为是一项国际罪行。与文中这位母亲等许多无法具名的受害妇女打交道的社会心理辅导员表示，让受害人感到内疚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她的故事有着一个令人满意的、近乎美满的结局。像她这般坚强的女人，凭借着她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对自己儿子无穷的爱，用自己粗糙的双手长年辛勤耕耘，让自己和孩子有意义地生活下去。要知道，当她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她一度曾想把他抛弃。在另一位给了她工作、让她能够过活的妇女对她进行一番劝说之后，她答应讲述自己故事，谈论自己是如何抵抗社会习俗以及她家人的愤怒，保留并抚育这个幼小的生命。

29岁那年，她被塞族战士从位于波斯尼亚东部的一个村庄的家中赶出来，与其他450多名波斯尼亚族人被围困在一起。妇女与男子被分开（其中有些人再也未能见面），并囚禁在“强奸房”内。波斯尼亚部队在9天后解放了这些妇女。然而，

此前她曾被一名士兵性虐待，她肯定那个士兵来自现在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而不是波斯尼亚塞族，那个士兵对她高喊着种族侮辱口号，在强奸前还对她施加殴打，致使她昏迷不醒。数月之后，她再次被6名男子抓获并强奸。施暴之后，他们把浑身是血的她扔在了河堤上。波斯尼亚村民发现了她，给了她衣服和住所。次年春天，她便生下了一个男孩。

她通过翻译表示，“我告诉社工我不想要那个孩子。”“但我很高兴听到是个男孩，”她说，“如果是女孩的话，她可能要经历同样的不幸。”当时，她已有7个月没有与孩子见面，但最终却抑制不住见到孩子的渴望，前去看孤儿院看他，尽管她连孩子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她最后是在一家医院找到了他，孩子正在生病，营养不良。

“那里没有多少食物，”她说，“他把整个小手到手腕都填到嘴里吮吸。当我看见他在吸他的拳头，我决定不管情况如何也要带走他。”婴儿被转移到一家孤儿院，并以她的名字注册，这样他就无法被别人领养。从此，他成为她生活的中心和目的。她无法把他带回家里，因为她与父亲和兄弟同住，而他们谁也不希望见到那个孩子。有一次，她的父亲打了她，因为他在她床下发现了一双小靴子，当时她正准备把那双小靴子带到孤儿院送给孩子，她还经常给他送去一些食物和衣物。他知道她是他的母亲，每当她离开的时候，孩子会死命抱着她不放。“从那以后，我一直为他而

战斗，”她说。

1994年，她找到一份工作，干起了办公室清洁工。1998年，她买了一小块土地，利用一些捐赠物资，开始自己造房子。1999年，房子终于建好了。她说：“当年7月份，我搬到了那里，并把他带回了家。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在家，和我在一起。”

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的过去仍然会令她感到痛苦。“我总会回想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银幕放映着过去的一切，我还要再次经历那些事情。每个月，我可能只有五个晚上才能够睡着。”她的儿子从来没有问她的过去，虽然他们一起观看过《格巴维察》（又名：旅行之歌）这部电影。该电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与她的故事不同。她不知道他是否已经产生了怀疑。在她们现在居住的村庄，许多男孩也都没有父亲。他们来自斯雷布雷尼察，那里的数千名男性社会成员在1995年被屠杀。学校行政人员也非常同情这些孩子。

她的儿子是个好孩子，她说：“谦虚，要求不高。”尽管他学习不怎么好，现在在一个技校上学，她说，“最重要的是，他是健康的，还渴望工作。工作拯救了我。它为我提供盖房子和生存的能力。”

“有时我问自己，是什么赋予了我力量，”她边说边回顾着自己的人生，“我来自一个有6个孩子的农村家庭，家里以农活为生。我从小就喜欢我的工作成果。”宗教对她非常重要，她补充说，“如果你没有信念，你就没有自己的特质。人们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方向。”